

林非的儒雅

■刘江滨

不见林非先生久矣。

最近因一篇稿子的事，和林非先生的夫人肖凤老师通了电话。电话两端虽然隔着遥远的空间距离，虽然跨越了十多年的时间长度，却瞬间连接上了那份亲切和熟稔。一切阻隔顿时化为乌有。放下电话许久了，我还沉浸在回味中，如烟的往事清晰地脑海海聚拢起来，一一映现。

在与林非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中，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两个字：儒雅。那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修养，那种从容淡定的优雅风度，那种恂恂如也的君子做派，那种民主平等的大家风范，都令人倾倒，令人钦佩。在他身上，既有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情怀，又有现代学者的意识，他将二者冶为一炉，炼出一粒金丹来。

我是1994年结识林非先生的，于今25年了。那年夏天，《散文百家》与《地火》杂志联合在郑州举行散文笔会，林非先生是特邀嘉宾，我是《散文百家》的特约编辑。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时曾痴迷鲁迅，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，林非与人合著的《鲁迅传》影响很大，自然是在读之列。林非先生是鲁迅研究会会长，是国内最顶级的学

者，后来又转向散文研究和写作，担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，他的《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》《中国现代散文史稿》以及论文《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》都是教科书一样的领航之作，故他在我心里就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以前我见过萧军、刘绍棠、从维熙等名家，但只是混然众人的一个听众而已，远远的伫望，无缘亲炙警歎。而今要和林非先生“亲密接触”好几天，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。那天，林非先生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只见他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衫，面白皙，笑眯眯的，和蔼可亲，而且身材高大，腰板挺得直直，更显挺拔，儒雅里含有特别的精气神儿。我怀疑他军人出身，一打听，果然他在上复旦大学之前当过兵。他有一篇散文《渡过长江去》，开头这样写道：“1949年2月，我辗转去了江苏盐城解放区的华中大学。刚安顿下来听了几回报告，就编进了南下的部队。”那次笔会，除听了林非先生的讲座以及研讨，还去了洛阳、开封等地采风，天天在一起，逐渐熟悉起来，也慢慢消除了拘谨感。林非先生毫无“权威”的威严自大，而是平易近人，谦和有礼，无论在会上还是会下，他都是充分倾听并尊重别人的意见，和大家相处得融洽愉快。

印象很深的一次，林非先生在举行讲座时，讲到散文写作要注意用词准确，举了一个例子：宾馆

房间门口晚上休息的时候要挂上“请勿打扰”的牌子，如果将“打扰”改为“骚扰”就不要帖。就过了。晚饭后，我和几位年轻人去林非先生房间聊天，一进门，我说，林先生，我们来“骚扰”您了。林先生不以为忤，会心一笑，连声说道，欢迎“骚扰”，欢迎“骚扰”。房间里一片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

郑州笔会，不仅让我领教了一位大学者的博学，每行一处，林非先生都能讲出相关的典故和故事，而且他气质优雅、风度翩翩，举手投足都那么大方得体，温文尔雅，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着迷。其实与此吻合，他的雅致和从容也流淌在其文章的字里行间，循循善诱，温和理性，罕有疾言厉色、火星四溅。这之后，我和林非先生开始了通信联系，保持了很长时间。其中距郑州笔会不久，林非先生给我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郑州欢聚，终生难忘。你极有创见的论文，对我的启迪更是分外清晰，常记心间。”这种平等的语气和热情的鼓励，对我这样一个刚入文坛不久的青年感到异常的温暖，其生发的力量不言而喻。

大约过了两年，林非生主编《中国当代散文大系》，有关河北作家的撰稿及作品收集的任务交给了我。这可是文学史性质的“大活儿”，我既感到了信任也感到了压力。我由自己和铁凝、梅洁、张立勤等作家建立了联系，开辟了一条

散文研究的坦途。1998年我调到省城报社之后，约林先生给副刊写了一些稿子，每次他都谦虚地称“补白”。他主编的《中国现当代散文三百篇》，我的《夜读》有幸附为骖尾，我是最年轻的作者之一。对此我深深感激林先生对我的垂青与提携，但林先生却丝毫没有“恩赐”的居高临下，反而来信感谢我“慨然允诺收入大作”。这真是大学者的君子风范，越是平等待人，就越叫人仰望。

后来去北京几次出差，都来去匆匆，未及与林先生晤面。当我写信告诉他时，他回信表示“愤怒”。这加了引号的“愤怒”让我心里涌出一股暖流。他在另一封信中说：“很想有机会好好谈一回。我无去贵邑的机会。你如来京组稿，可于会间住一宿（分楼上楼下，洗澡等事均互不干扰），长谈一次。”并告知具体住址。2000年6月，我借去北京开会，一天上午专门去林先生的寓所造访。他所居住的静淑苑，绿树掩映，花草繁茂，整洁幽静。肖凤老师也在家。肖凤也是国内著名作家、学者，在北京广播学院（即中国传媒大学）任教，著有《冰心传》《萧红传》等作品。二老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我和林先生在他宽大的书房聊天，天南海北，极为尽兴，不觉已到中午，我提出告辞。林先生、肖老师却无论如何不肯放我

走，请我在静淑苑附近一家餐馆就餐。林非是国内鲁迅研究界、散文界的泰山北斗，却以老朋友的身份请我这个晚辈吃饭，我自叹何幸如之！另外，我还有一个意外收获：曾听闻，林非夫妇相敬如宾，互相尊重，之间做了什么帮助的事情要说谢谢，这次我算是亲眼所见，真实不虚。林非先生对妻子十分关爱照拂，走路他要走在外侧，让肖老师走里侧，十足的绅士风度。肖老师对他小有照顾，比如递过餐具之类，林非先生会说谢谢。同样，肖老师亦如此。“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”曾是古代夫妇相处的最高境界，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到？林非先生、肖老师真是一对允称典范的佳偶伉俪。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，林非先生的儒雅体现在社会、家庭等日常的方方面面，这种修养是渗透在骨髓里的。

儒雅，是气质，是风度，是修养，也是一种品德。孔子云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这原本是说内容和形式的恰然相配，被后人视作君子的中和之美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道德气质修养是其根本。当下有一些所谓的文人雅士，读书也不少，却语言粗鄙、举止粗俗、行为粗野，与文明和美的创造者身份毫不匹配。在这方面，林非先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。

悼方成

■王春瑜

常言道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但这毕竟是古人长谈的老调了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，医疗水平的提高，活到一百岁的寿星，大有人在。今年8月，漫画大师方成先生在友谊医院病逝，享年百岁，这在我国民间称喜丧。事实上，早在九年前，我在写《杂谈人物琐录》中写道方成先生时，即说“眼前的方成，真是个好老头，甚至是老顽童，他至今能爬泰山，身体之好可想而知。他倘若活不到一百岁，那肯定是老天爷犯糊涂了。”事实证明，老天爷并未犯糊涂。我不仅又想起好几年前我们在宁波的一次聚会。席上有清蒸飞鱼，一位中年漫画家开玩笑说：“方老，您把这条飞鱼吃了，就能飞上天！”方老说：“飞上天好啊，但下不来可咋办哪？”那位画家说，不是说上天是天堂吗？您就在那儿呆着吧，活到一百岁拉倒。没想到，方老严肃地说：“一百岁，我是上不了封顶的！”但现在看来，正如俗话所说，天高意难测，人翻不过老天爷的手掌心。一百岁上终究被封顶了，成了方老的终天之憾。

但我想，如果方成翁天上有知，他在天堂里会不会发出朗朗笑声。因为，无论是当代还是后世，不管是学者、作家，还是普通读者，只要写道、提到杂文、漫画，有谁能忘记方成？他的《武大郎开店》既是家喻户晓的漫画，也是优秀的杂文。而且，依愚见，一百年后，甚至一千年后，这幅漫画仍然会受到人们的赞赏。何以故？那时的武大不会绝迹，武大郎式的人物仍会继续开店。

方成老家是广东中山，因此他的画上常盖有一枚印章“中山郎”，不免使人立刻想到“中山狼”，思俊不禁。有一年，我数月不见方成，很是想念，遂去他府上拜访，看见他正在数钱，遂问他何故，他说，我准备去中山探望我妹妹，坐飞机到广州，再换乘汽车。我一听大喜，说，我未到过中山，名著《断鸿零雁记》作者苏曼殊居士故居就在中山，我想去看一看。方老说，哎呀，你现在就把身份证给我，我托《人民日报》服务中心帮我们买机票，你赶紧回家收拾一下过来，下午就走。到了首都机场，他对我说：你把机票给我，我走得比你快，我去办登机手续。方老比我大二十岁，这顿使我汗颜。他把机票交给我之后，我立即把机票钱交给他，可他只收一百元，说“意思一下吧，我工资比你高，挣稿费也很容易，你不用跟我客气。”方老的厚道可见一斑。

到了中山后，我陪他去见了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也快八十岁了，他硬塞给她三千元。方老对她问寒问暖，但却不肯在她家吃饭，不愿让她破费。

我随他去广州麒麟山疗养院度假。疗养院很高级，风景宜人，伙食一流。吃晚饭时，我半开玩笑地说：方老，您何时有空，给我画一幅鲁智深像，用毛笔在宣纸上画，画得越凶恶越好，我会上面题跋，包您看个哈哈大笑！他说：“是嘛，我到时板起个脸，一笑不笑。”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大清早，他就来敲我的门，说“我昨晚开了个夜工，画了这幅鲁智深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一看，大喜过望！画中鲁智深，浓眉大眼，绕腮胡又粗又密，手执巨铲，寒光闪闪。我连声称谢，说，“方老，画得太好了！”早饭后，我去他的房间，拿起画笔在画上题跋，盛赞鲁达老哥是活佛，因为除恶即是佛，云云。文末并书“盐城百姓王三爷春瑜见方成大师造鲁智深佛像”云云，他看了不禁大笑。这幅画横竖超过二尺半，返京后我被好装在大玻璃镜框中，置于书房，朝夕相对，诚赏心乐事也！同时，方老的情绪也随之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成了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闲话“鸡肋”

■李景瑞

“鸡肋”，本是普通的一种乏味食材，也许因为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杨修因自作聪明，擅自解析口令“鸡肋”导致丧命这则典故，使“鸡肋”一词，常常被用作“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”的比喻。纵观如今，餐桌上依然会有“鸡肋”，而在生活中，不同表现的“鸡肋”现象，包括由此衍生出收效甚微的形式主义，似乎更不可见。

按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释义，“鸡肋”：“比喻没有多大价值、多大意思的事情”。既然“没有多大价值”，那么本应不做或少做，但现实生活中，却常见明知“没有多大价值”，却依然热衷去做，有的甚至还不惜巨大投入，硬着头皮去做。譬如市场营销中公布的某些流量、点击率、收视率、票房数、跟帖数、排行榜、竞赛名次、意向订数，网店点赞率、回访好评率，等等，有不少都是表面上好看，实际效果远非如此。尽管这样，还是有许多人，对这类“鸡肋”趋之若鹜，争相为“鸡

肋”包装，有的甚至不惜造假，耍花枪，给“鸡肋”涂粉上色，借此吸引公众的眼球。

也许有些人对上述“鸡肋现象”见多了，心理上变得习以为常，不自觉地滋生出一种“鸡肋心态”，就是不好吃，不想吃，但还是吃了。譬如，有些事明显投入大，产出小，可做可不做。眼看别人都在做，也只好跟着做，但做了又觉收效小，以至产生随大流，勉强从众，或者满足于表面上像样就行的惰性心理。

就我接触的出版人来说，就听到有些人反映，现在办书展很内耗，有些展场人气很高，这对提升群众阅读风气确有好处，值得提倡。但又觉得仿佛有点跟风，办得稍显频繁。境外书展不算，仅就国内而言，现在除了全国性的图书博览会、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之外，还有许多省级的，市级的，各个行业的书展、书市、展销会，以及图书馆的馆藏书采购会等，一年不下十场，有时一个月内不止开一场。不少出版社收到邀请，明知如今多是网络批销，现场零售数额很小，但又不想放弃宣传图书的机会。

结果投入大，展台租费和人员差旅费，却得不到什么经济回报。造成不去可惜，去了又常失望。

又如，现在某社出了一部什么书，常喜欢召开新书发布会。从宣传图书来讲，做点广告也属正常，但是否都需要采取发布会这种方式？因为书才上市，与会人连书还没来得及看，到会只好说些吹捧空话。对有些重要的大型系列书，需要通报编撰初衷、背景、内容及品读指导等，开次发布会当然有价值。至于其他一般的图书，倘若把开发布会这类活动办得太随便，就难免有单纯作秀之嫌，并无议书之实。尤其是时下有些“名士”的汇编书，企业家的经营自诩书，艺人的注水随笔书等，也往往开个发布会造势。这对于举办者和与会人来讲，恐怕都会有种“鸡肋心态”的阴影。

现实中还有一种“鸡肋现象”更令人反感，就是商品的过度包装。不少人大概都收到过大容量、相当精致的礼品盒。其实里边装的不过是一两茶叶，或几块糕点，可是层层加料套装，其包装盒价值甚至超过小礼品本身。这些过度



包装，十足是留着无用、弃之可惜的时尚“鸡肋”。

“鸡肋”可食不可爱，这是它客观的存在。问题在于人们面对其中悖论的态度。既然是明知，就应善于分析，区别对待。有的该扬，

有的该弃，扬弃均该有度。“鸡肋”不会消失，但要因人而异，因势利导。凡事切忌只重表面，无视实效。对待“鸡肋”，但愿少一些追求形式主义的摆谱，多一些讲究实效的理性思考。

丰子恺逃难

■钟桂松

艺术大师丰子恺以他清新的笔调创作了大量散文随笔，以“缘缘堂随笔”“续笔”“新笔”等与世人见面，让人欣赏到他温润而充满人间情味的文章之美，令人咀嚼之后回味无穷；丰子恺先生还以“儿童相”“社会相”“人间相”等主题，创作了大量的“子恺漫画”，以流畅的线条和简单生动的形象，深刻细微地揭示了人间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。此外，丰子恺在中外音乐、西洋美术、教育、佛教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，



留下了大量的作品。

所以在一般读者心目中，丰子恺是一位潇洒、悠然的艺术大师，在杭州当寓公，写写美文，画画生动有趣的漫画，或者听听西洋音乐，拉拉小提琴，弹弹钢琴，如果累了，再欣赏一下西方美术家的作品，或者怡然自得地喝着绍兴黄酒，品味着酒中岁月，过着“潇洒风神”的生活！

其实，丰子恺先生并非读者所想象的那样潇洒，他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动荡时代的旧社会里度过的。他少年丧父，青年时丧胞姐和胞弟，中年丧母；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，刚刚建好的住宅“缘缘堂”被日本的炮火炸毁，从此，丰子恺流离失所，背井离乡，扶老携幼，过着长达八九年的逃难生活。

1937年11月至1946年秋，丰子恺从石门湾悦鸿村一直逃难到陪都重庆，一路上的辛苦、奔波、纠结和痛苦，让四十多岁的丰子恺胡须全白！他曾说：“我的胡须逃出来时是全黑的，到萍乡白了三分，到广西生伤寒病，又白了三分，到贵州生痢疾，又白了三分。”还说：“假如不逃难，我身体一定还要好，我的胡子一定不会白。”事实也是这样，在逃难途中，车马劳顿，还被人敲竹杠。1937年11月，天气已经寒冷，丰子恺到杭州

钱塘江边租了一只船，载了十多个人，连夜驶往桐庐。不料，讲定25元送到桐庐，在月黑风高的夜里，船老大摇到半路上，不肯去了，向逃难的丰子恺他们敲竹杠，要加一倍的价钱。随同逃难的工人平玉好说歹说，答应给船老大加钱，才慢慢地往桐庐方向摇去。船到桐庐，因为船老大起了歹意，平玉怒不可遏，揪住船老大的衣服，要拉他去县公安局评理，告他敲诈良民！直到船老大求饶为止。开始逃难，丰子恺就感觉漂泊的艰辛，我“人间以漂泊为苦，比之于蓬絮我人间一大群眷族，这漂泊又非蓬絮可比。我们从这时候起，渐感觉一家好比覆巢之鸟。”

逃难途中的躲警报，常常让丰子恺狼狈不堪。1939年，丰子恺在宜山浙江大学教书，有一次，警报突然响起。丰子恺正在家里，他本能地抱起幼子新枚，带着姐姐丰满，以及软软、丰一吟，随着浙江大学同事，直奔附近山坡上，见一块大石头下面有一条数尺宽的石缝，虽然里面杂草丛生，但可容纳多人进去躲避。可是，石缝进口有一个黄蜂窠，那些黄蜂像那么多人进来，群起而攻之，刚刚挤进石缝的人立刻手脚并用往外逃，顷刻间，石缝里一片混乱。此时，突然又响起空袭警报，刚刚逃出来的二十多人不顾石缝里黄蜂

螫了，又重新钻进石缝里去。丰子恺转身慢一点，石缝里已经挤满了人，没有藏身之处，只好卧在石缝外面一块大石头边上的草丛里。爬在草丛里的丰子恺，远远的看见九架敌机，由远而近，盘旋着轰炸宜山。

有一次，寂静的清晨突然响起了警报，丰子恺急忙率全家老幼离家去郊外躲空袭。逃到半路上，忽然警报解除。丰子恺想：早饭还没有吃过。于是丰子恺招呼全家回去吃早餐。刚吃了两口稀饭，警报又响起了，只好放下粥碗手忙脚乱紧张张奔出家门，往龙山方向跑去。这时，天下起雨来，六个人，三把伞，又冷又湿又饿，走到山脚向的乱坟岗边，大家都累得走不动了。丰子恺让女儿软软去附近看看，能不能买点东西充饥。结果“食物有了不可得”。忽然，丰子恺远远看见雨中的一个村妇，手挽竹篮从村里出来，似乎是卖小食的。丰子恺冒雨追过去，果然，篮子里是糯米团子，于是买了几个回来，家里也送早粥过来，大家还是不敢回家，就在一个上一年新修的坟墓边吃粥团子，而幼儿丰新枚就睡在墓旁草丛中。丰子恺回头看：“青蛙跳登其胸，蚂蚁巡游其项，而新枚熟睡如故。”

这样的逃难生活，给丰子恺创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逃难生活